联合国 S/PV.8346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三四六次会议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黑利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瓜迪女士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格雷瓜尔·范·哈伦夫人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腐败与冲突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8-280828 (C)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腐败与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到此为止”计划创始总裁兼“步哨”组织共同创始人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参加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美国组织这次通报会，这反映我们认识到了打击腐败，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都存在腐败。数字显示，这一挑战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世界经济论坛估计，腐败的代价不少于2.6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5%。据世界银行称，企业和个人每年支付的贿赂数额超过1万亿美元。

腐败从学校和医院等机构手中夺走急需的资金。腐败导致机构溃烂：公职人员中饱私囊或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腐败剥夺人们的权利，使外国投资望而却步、环境遭到劫掠。腐败滋生对政府和治理的幻灭感，往往是政治功能失调和社会分裂的根源。穷人和弱势群体遭受的痛苦尤为深重，有罪不罚使问题雪上加霜。

腐败可能会引发冲突。腐败随着冲突加剧而日益猖獗。即使冲突缓解，腐败也会阻碍复苏。腐败促使政治和社会机构崩溃并借此壮大。这些机构在冲突时期面临的危机最为深重。腐败与多种形式的不稳定和暴力有关，例如非法贩运武器、毒品和人口。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确认，腐败、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相互关联。通过腐败窃取的资产可进一步用于资助犯罪行为，包括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行径。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进行的大规模腐败调查发现，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贿赂公职人员的现象尤为严重。在冲突局势中，反腐败委员会、民间社会和媒体等利益攸关方的基本工作可能会遭到削弱或阻碍。

冲突时期腐败的后果可能会特别严重，导致最基本的需要难以满足，加剧饥饿和贫困。

会员国必须站在反腐败斗争的前沿。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和检察机构的能力建设尤为重要。各国政府还可以通过确保司法独立、民间社会充满活力、媒体自由和有效保护举报人来加强反腐败努力。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更有效地打击洗钱、逃税和非法资金流动来为这些努力提供补充。上述行为剥夺各国急需的资源，进一步助长腐败。

如安理会成员所知，我一直呼吁加强努力，争取在冲突和风险升级之前，及早预防冲突和消除风险。本着这一精神，打击腐败现象和应对治理挑战——此类现象和挑战是许多冲突的根源——必须是预防性办法的组成部分。这是一次机会，以便建立坚实的信任和问责基础，并增强社会抵御危机的能力。

在和平行动中，应以更明确的反腐视角制定和执行我们的介入措施，以强化问责文化和遵守法治。非洲联盟在其今年1月峰会上启动了2018年作为非洲反腐败年的纪念活动。我高兴地注意到，尼日利亚和突尼斯的反洗钱努力促成了资金退还。

正如我5月份在纪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十五周年时向大会所说的那样，联合国的作用至关重要。本组织可通过若干方式支持会员国，从分享良

好做法到支持努力加强国家反腐败机构，不一而足。消除危地马拉国内有罪不罚现象国际委员会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通过《公约》之前，没有任何全球文书将腐败定为刑事犯罪或追回被盗收益。现在，《公约》有186个缔约国，腐败罪已列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典籍。《公约》强有力的同行审查机制成为全球国际合作框架，以便加强预防、挫败洗钱图谋、从外国银行归还被盗收益以及开展其他必要行动。我鼓励所有会员国拿出更大决心来执行《公约》。

让我们也利用技术进步，这使我们有机会大规模扩大公众对治理的参与并加强问责。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公约和法律措施必须得到强有力的领导的配合，这种领导能够将腐败现象上升为人们的一种关切，并使之成为采取行动加以处理的优先事项。

世界各国人民继续对其领导人的腐败以及腐败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程度表示愤慨。他们正确地呼吁政治建制以透明和可问责的方式运作，否则就让位于那些愿意这样做的建制。我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倾听民众的呼声，培育清廉文化，增强公民权能，使之能在基层发挥作用。我们都必须作出更多努力来打击腐败、加强治理和建立能确保人人正直和进步的值得信赖的机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发言。

普伦德加斯特先生（*以英语发言*）：纵观历史，战争可能是地狱，但对于一小群从冲突中牟利者来说，战争也非常有利可图。今天非洲最致命的冲突，例如南苏丹、索马里、尼日利亚北部、苏丹、中非共和国以及也许最重要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都是靠战争经济中出现的非同寻常的非法追逐私利机会来维持。在战争经济中，重大腐败行为和大规模暴行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国家军队和反叛分子利用极端暴力来控制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偷运网络，包括贩运野生物的网络。暴力变得能从抢劫、掠夺自然资源和盗窃国家资产的行为中自筹资金，银行和商业联系从纽约这里延伸到伦敦、迪拜和许多其他全球金融中心。

这些被劫持的非洲国家，其态势当然类似于世界各地其他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态势，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利用国内外商业协作者和金融家网络来使自己变得富有，使商业和政治网络获利，并通常牢牢抓住权力不放。军火商、象牙贩运者、黄金和钻石偷运者、矿物经销商、石油公司、建筑公司等与政府官员和反叛军阀相勾结，有时还与恐怖主义网络相勾结，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为极少数人牟利。这些网络掌握着娴熟的高科技，善于操纵合法的金融、贸易和运输系统，利用洗钱、逃避监管和制裁、掩盖实益所有权、挪占国家资源和资产、欺诈安全部门、使资产离岸等种种手段，致使执法、监管或本机关或其他机构实施的国际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未触及到它们。

这些冲突的核心是争夺对被劫持国家以及使有关国家获得资产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控制权。控制国家机构是获取这些资源的最可靠途径。将国家预算转入作为暴力镇压异见的首要手段的军队和内部安全部门，是保障军队和内部安全部门的方式。

除非安全理事会及其他具有潜在影响力的相关各方能够创造杠杆来改变这些态势，否则，基本情况就是，对于那些处于冲突和腐败核心的人来说，战争就依然比和平更为有利可图。就是这些得益于战争经济的人，往往是和平谈判中的权力经纪者，他们通过谈判达成和执行解决办法的积极性很有限，事实上，有时根本没有这种积极性，如果遵守这种协议意味着要蒙受经济损失，则尤其如此。

因此，和平努力需要注重改变冲突，也就是说，必须废除战争经济，必须彻底改革被劫持国家机构——这种国家机构巧取豪夺的本质常常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从而让它们履行原定职能。在自

然资源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巨大的掠夺和腐败机会的国家，这一点更难做到。

引人瞩目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任何协调的战略来制止领导人及其外国商业伙伴非法吸收资金或打破腐败与冲突之间的联系。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注入非洲，以清理这些骇人听闻的乱局。在世界各地，联合国机构、纳税人和捐助国政府资助维和部队、国家建设方案、人道主义援助、选举以及和平进程，但这些支助都未能阻止腐败的领导人及其受益者网络窃取数十亿美元，因为领导这些努力的外交官根本无法改变致使冲突旷日持久的制度。这牵涉的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制度改革。

多年来，建立打击损害和平或人权的行为体的杠杆的首选工具一直是实施定向制裁。但是，在这些局势中，尤其是在非洲，本机关和许多会员国经常实施的制裁一直不足。制裁不常用，受制裁者太少。制裁往往太弱，因为没有规定要将导致冲突的腐败现象责任人作为制裁对象。换言之，对于促成贪婪所助长的极端暴力网络的核心人物及其商业协作者，我们很少进行制裁。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缺乏有意义的执行，交战各方已经将此类一次性、而且执行无常的制裁视为给其公关工作带来略微不便的烦恼，并没有将其视为对他们权力构成的严重威胁。

现在缺少的是使用施加财政压力的政策工具，切实改变那些犯下暴行和使战争旷日持久的人的成本效益盘算。显而易见，这些领导者及其商业协作者不会把钱藏在床垫下。相反，他们是通过国际金融系统来洗钱，使钱离岸进入房地产、空壳公司或前线公司以及银行账户。这样，他们就容易暴露。因此，必须采取重点十分明确的措施，追踪这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具体非法活动。如果这一活动被阻止，而且这些行窃网络的薄弱环节被暴露并受到打击，只有这时，联合国特使及其他外交官才能取得实际进展，逐步促成和支持执行和平协议，走向持久和平，并且惠及长期受苦的民众。

安全理事会及其他有关各方可使用的政策工具有三种：第一，注重网络的制裁办法，侧重于重大腐败的行为；第二，反洗钱措施，侧重于通过国际金融系统的非法资金流动；第三，如秘书长所言，起诉，在这种情况下，侧重于同暴行有关联的金融犯罪。

我们来看第一种。必须对整个网络而不只是个人实施制裁。这是安全理事会及其他各方迫使伊朗和朝鲜走向谈判桌所采用的办法。以这种方式将网络作为目标的制裁是改变行为和迫使个人妥协的强有力工具。这些网络制裁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它们不仅影响制裁的首要目标本身，而且还影响在支持制裁目标的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和公司。通过同时或连续密集地制裁个人和实体，并确保开展强有力的执法这一关键行动，主要目标的网络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被切断，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受到的财务影响中恢复过来。

为落实这一行动，安理会应将“与冲突有关的腐败”作为其现有制裁方案的新增制裁标准，并确保专家小组的任务是报告与冲突有关的腐败。必须向专家小组提供开展这项工作所需的支持，包括确保向造成迈克尔•夏普和赛达•卡塔兰惨死的责任人追究责任。

第二，安理会应加强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和类似区域机构等反洗钱机构的接触，并确保制裁制度提及打击为腐败收益洗钱的重要性。这些组织需要安全理事会的帮助来加强其工作。

在为了加强安全理事会的能力，使之更有效地打击加剧冲突的腐败活动而进行的任何努力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仅仅与政府合作。安理会可以通过扩大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联系和互动来消除由腐败助长的冲突，从而大大加强其杠杆作用。私营部门的某些要素可以成为支持实现这些目标的辅助手段。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当金融犯罪与冲突和暴行有关时，法院必须有权起诉金融犯罪，尤其是那

些源于腐败的金融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和其他拥有特别管辖权的法院，例如中非共和国特别刑事法院或南苏丹问题混合法院，必须有权起诉这些金融犯罪。

最终，这些施加财政压力的工具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像秘书长今天所说的那样，应该在加强外交、支持追究责任和透明度的政府机构的全面战略的背景下进行部署，并为民间社会促进人权与和解的努力提供空间。现在看来——而且这起到了大大的促进作用——战争罪要付出财政代价。为了有机会实现和平，世界各地那些得益于冲突造成的人类痛苦的人需要付出代价，无论是财政、法律还是政治代价，并且必须结束构成其基础的腐败制度。

主席女士，我感谢你邀请我今天发言并提请注意这一关键问题。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考虑制定一项更有力的行动计划，打击目前正在全世界毁灭数百万人生命，由腐败助长的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以美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今天到此与会，阐明腐败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

我还要感谢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告诉我们他的团队做了那些重要工作来披露腐败助长冲突的方式；感谢他向我们提出明确建议，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做什么来制止腐败。

我感谢大家为此与会，这是安全理事会关于腐败与冲突之间关系的第一次会议。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处理。我们一直在这里讨论冲突问题，但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腐败如何助长动荡、暴力和犯罪活动，从而将这些国家列入我们的议程。我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部署了蓝盔部队。我们设立了大规模的援助团。我们派专家到世界各地。但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腐败。

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将财富从无权无势者转移到有权有势者。贿赂、内幕交易、掠取公共资金和将人道主义援助挪作他用——这就是最贫穷者不情愿地向有权有势者和腐败政权进献钱物的各种方式。当这种负担重得让人难以忍受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反应。腐败还使跨国犯罪和贩毒猖獗起来，威胁到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由此造成的不稳定以及绝望者出走的现象表明，腐败不仅是一个内部问题；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引起区域和全球关注的问题。

2010年12月17日，一位默默无闻的突尼斯水果贩子坐在地方长官办公室门前，把油漆稀释剂洒在身上并自焚。穆罕默德•布阿齐兹的绝望之举引发了阿拉伯之春，使他成为对专制政府进行抗议的标志。人们往往不清楚的是，是腐败逼迫穆罕默德公开并痛苦地自杀。穆罕默德与突尼斯其他贫穷的街头小贩一样，经常受到索贿官员的骚扰。他在自杀前几个小时，经历了当地警察又一次羞辱性骚扰。也许希望别人能理解他的困境，穆罕默德采取了最极端的抗议行动来反对这种不仅剥夺其生计，而且剥夺其尊严的制度。

穆罕默德的行动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反腐起义的浪潮。几十年来似乎一直保持稳定的政府在几周之内就垮台了。在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由于腐败的领导人及其亲信试图继续执政，抗议活动迅速升级为冲突。所有这些动乱最终都进入了安全理事会的议程。实际上，“透明国际”组织认定的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中有9个名列安理会议程——十分之九。然而，联合国经常情愿忽视腐败问题，而不是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担心处理这一问题会使政府垮台并使合作停止，或者我们认为腐败只是在这些国家开展工作要付出的代价。

但这种回避现实的方法是本末倒置。在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腐败不仅仅是制度的一部分；腐败就是制度。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的政府不是为民众服务，偶尔出现一些腐败现象；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腐败就是手段。

实际上，腐败的政权不能被忽视、悄悄或低声地被摒弃或处理。如果安全理事会要兑现其对于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就必须处理腐败问题。我们周围有许多腐败导致冲突的例子。据估计，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腐败政府从乌克兰人民手中盗走了高达1000亿美元。他的奢侈生活方式恶名远扬，乌克兰人民对此民愤极大。当亚努科维奇最终因其罪行而遭驱逐时，这一事件在全球造成了连锁效应。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开始了自冷战以来莫斯科与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对抗。

腐败也助长了恐怖主义运动。人们看到政府内部人员通过窃取资源或索贿致富，那么恐怖分子招募这些人的时机也成熟了。博科哈拉姆组织在尼日利亚主要是因为反对政府腐败和压迫而获得权力和支持。该组织暴力袭击的第一批目标是尼日利亚的警察局，因为那里有臭名昭著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警察部队。在博科哈拉姆组织发动野蛮袭击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同时，尼日利亚领导人盗走了用以打败恐怖主义的大量钱财。从那以后，尼日利亚已采取实际步骤实施改革，我们要赞扬认识到改革必要性的政府。

腐败使冲突得以持续和延长。南苏丹的民族分裂是确实的，但正如我们今天早些时候所听到的那样，冲突源于谁将控制南苏丹石油收入的斗争。在以一种南苏丹人民认为公平的方式透明地分配自然资源之前，内战将继续下去。在非洲其他地方，各团体利用自然资源，甚至通过贩卖野生动植物来支付战争费用。

腐败还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人们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清洗掠夺来的资金。为制止这一现象，美国采取了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的行动。通过《打击腐败政府计划》、《反海外腐败法》和《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我们得以让参与贩毒、武器贩运和洗钱的腐败分子收手。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等国，腐败助长冲突或有碍解决冲突，美国财政部已实施重大制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财政部利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的授权，以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腐败为由，对商人丹•格特勒、一名关联的个人以及33个实体实施制裁。

在委内瑞拉，美国财政部对政府官员实施了定向制裁，以阻止他们通过国际金融体系转移窃取的财产。我们还分外小心，确保我们的制裁措施直接针对马杜罗政权，而非委内瑞拉人民。今天晚些时候，美国将主办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专门讨论委内瑞拉的腐败对其人民造成的损失以及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我们欢迎所有会员国参加本次会议。

去年，在美国担任主席国期间，我们曾表明，人权是个和平与安全问题。今年，我们同样主张安理会不失时机地关注腐败问题。待到穆罕默德•布阿齐兹这样的人开始抨击其压迫者时，防止腐败成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威胁就为时过晚。

对于认真履行安全理事会成员职责的同事，我极力主张我们从长计议。我们现在不认真对待腐败问题，就注定要应对它今后造成的暴力。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责。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要感谢你今天将这一颇为重要的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程。我要感谢秘书长颇有见地的发言。

我还要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我饶有兴趣地听取了他对需要处理的三个主要议题、何以必须将制裁范围扩大到各种网络以及制度变革的看法。在安理会审议其面前的一些问题时，我希望我们能够遵从他的一些有益建议，并开展辩论，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腐败问题。

腐败无处不在。我们同迄今发言的发言者一样认为，腐败引发并加剧冲突。但更加重要的是，腐败是阻碍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主要障碍。腐败是一股

潜流，严重削弱为和平、和解及社区重建做出的努力，在许多情况下还导致这些努力突然失败。

我在喀布尔的亲身经历让我懂得，政府试图做正确的事情，而民众却看到低级官员在提供最基本的服务时企图敲诈他们，这时，腐败的后果便是民众不愿跟着政府走。每年，腐败造成的损失总计高达约一万亿美元。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破坏公共服务的提供，激起怨愤情绪，最终引发冲突。2003年，科菲·安南称之为一种“隐患”（A/58/PV.50，第10页）。

冲突和腐败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公认。我们今天听到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在叙利亚，我们看到腐败的政府如何招致怨愤情绪，从而引起不满，继而导致暴力和冲突。在巴尔干，许多族裔紧张局势因领导人不履行职责而加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伊拉克、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的研究表明，冲突一旦开始，会如何为贿赂和其他腐败行径创造更多机会。这反过来又破坏法治，从而助长进一步的冲突。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等恐怖团体利用腐败筹措行动经费，并吸纳新兵和宣传其意识形态。

任何国家都无法不受腐败的影响，我本国也是如此。因此，打击腐败的斗争需要从我们本国入手。我要着重强调联合王国最近为加强我们本国反腐工作而采取的三个步骤。2017年，我们通过了《犯罪资金法》，其中确立新的反腐工具，如关于无法解释的财富的命令。今年，我们宣布将建立一份公共登记册，列明海外公司，包括我国海外领土上各公司的实际所有权。这将有助于确保联合王国不会被腐败的领导人、商人和官员当作避风港。我们还设立了国家经济犯罪中心，隶属我国国家打击犯罪局，负责制定和协调我国的整体执法对策。

但是，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在当今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协调得当的反应。我们坚定支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要借此机会敦促所有尚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予以批准，因为它为指导集体努力提供了出色的国际框架。大会通过该《公约》（第58/4号决议）15年后，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势头，注重执行工作，并确保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都确保各自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相辅相成。

2016年，我们在伦敦主办了一次反腐败峰会，希望加大全球行动的力度。我们认为，峰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建立国际反腐败协调中心。该中心汇集了来自6个国家的专业执法官员，追踪重大腐败案件所涉的资产和个人。

追回资产是打击腐败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也是《反腐败公约》的一项基本原则。2017年，我们与美国、世界银行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共同主办了第一个追回资产问题全球论坛。该论坛有助于推进向尼日利亚返还3亿多美元失窃资产的安排。《公约》第六章着重强调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联合王国引以为豪的是，我国与若干国家开展合作，分享最佳做法和发展能力。在尼日利亚，我们向打击国际和国内金融和经济犯罪的要害机构提供技术援助和装备，并努力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

最后，联合王国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作出协调一致的应对，杜绝参与腐败者不受惩罚的现象，追回失窃资产，让公民敢于反对和举报腐败。这反过来将有助于预防和解决冲突。在作出这种应对方面，联合国应该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希望全体会员国携手努力，战胜腐败的领导人、商人和官员，确保他们无处藏身。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美国倡议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空前的会议，讨论打击冲突局势中腐败行为的问题。我们还由衷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腐败既是不稳定和冲突的后果，也是加剧二者的重要因素。因此，安理会是处理这一问题的适当

论坛，但是，我们在行动中必须遵循务实、可操作和不带意识形态的原则。

除严重削弱维护法治的机构之外，腐败还导致巨大的经济悬殊，助长有组织犯罪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从而破坏受影响国家的安全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在这方面，腐败可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障碍，特别是在处于冲突或冲突后局势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机构或机构薄弱。这些原本就脆弱的国家往往是腐败猖獗的首批受害者，腐败会影响政府稳定、公民安全和国家的未来。

除了对和平构成威胁，腐败也是发展的重大障碍。法国的务实做法摆脱任何意识形态因素，有助于我们将腐败视作对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它阴险叵测，腐蚀和平与发展。相反，善治——即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法律和体制环境——则是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充分参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反腐败斗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其通过十五年后仍是国际反腐败斗争的唯一普遍性文书和一大支柱。法国再次呼吁所有国家严格执行这项公约，尤其是通过其审查机制，这有助于确保有效监测该公约的适用情况。

在此框架内，各国都有责任和义务采取行动以制止腐败。既然我们在这里分享最佳做法，我谨简要分享法国的经验。通过动员更接近实地并推动创新举措的公共当局、经济行为体和民间社会，我们已显著加强自身的反腐败能力。为了防止和有效打击腐败，实地拥有重要专门知识和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必须落实国家、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联合在一起的联合战略。这是成功的关键。这些渠道是今年对法国所进行评估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该评估是《反腐败公约》第二个审查周期的一部分。

为了有效打击腐败，经济透明也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在2016年通过了一项关于透明度、打击腐败和经济现代化的法律。这项法律还设立了法国反腐败局，负责为公共和经济行为体起草在预防和协助发现腐败方面的建议，以及预防腐败的国家计划。我们鼓励所有国家设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制以预防和打击腐败。

除国家一级以外，区域和国际组织也可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反腐败努力，支持那些表示需要这些努力的国家。例如，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制定了尤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区域法律文书。20国集团也设有一个反腐败问题工作组，由法国与阿根廷担任共同主席，直到今年年底。

最后，我谨强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反腐败公约》担保方的关键作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许多反腐败活动，包括促进审查机制和技术援助活动——例如为法官和检察官开办培训讲习班或协助起草立法文件——以帮助各国履行它们在该领域的国际义务。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支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这方面的重要工作。

最后，我谨强调国际合作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性，这尤其是为了借鉴已有的最佳做法。因此，法国完全支持我们在2016年担任共同主席的开放式政府伙伴关系。这项举措旨在提高公共数据的开放性和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目前由来自各大洲的70多个国家组成，是预防腐败风险的强大工具。我们希望会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这些努力，我谨代表法国再次为此发出呼吁。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美国提供机会，讨论腐败如何助长冲突。对我们而言，我们主张进行全系统协调，加强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内部关联，尤其是在区域背景下。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与发展驱动力一道仔细审查该现象、将其作为冲突的后果具有附加值。

我们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和“到此为止”项目创始主任兼“哨兵”倡议共同创始人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全面而深刻的通报。

我国代表团谨就一些关键要点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我国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打击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各种威胁方面有自己的经验。有鉴于此，我们打算尽一切努力，支持我们对预防和控制腐败以确保和平的共同承诺。透明度、法治、善治和问责是根除腐败的方式。这对于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的社会都是如此。我们的经验表明，国家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国际关系和交易体系有助于避免腐败行为。孤立则起相反作用，助长国家和国际发展中的负面趋势。

第二，当今世界清楚地证明，发展与安全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当今面临旷日持久的冲突，其复杂的政治不稳定和紧张使我们的干预徒劳无果。为了处理这些现象，我们需要评估恐怖主义、武装团体、跨国犯罪、开发自然资源和历史遗留问题以及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等问题令人震惊的严重性和规模，并查明腐败如何渗透到所有这些问题当中。

另一方面，引发腐败的还有发展方面的根源问题所导致的无保障，这些根源包括：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贫困；食物、水和能源无保障；大量资金流入能力建设和发展援助。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和平，包括通过在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协作，我们需要推动一项三重战略，特别是为安全与发展之间密切、复杂、多方面、针对具体情况的关系创造潜力，利用创新的、经过改进的区域做法，以及加强联合国内部的协调，从而提高其有效性，确保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

第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指出了腐败与和平、公正、包容各方的社会之间的明确联系。该《议程》中最重要的承诺之一是，在提供服务、决策和伸张正义方面不应落下任何人。不解决一切形式的腐败，就不可能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

最后，我国坚信，单个国家的努力必须以今后团结一致的行动作为补充。至关重要的是，要为所有人营造一个和平具有可持续性而发展具有韧性的环境。然而，当我们谈论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制度和决议如何能够降低受腐败影响的冲突的发生率时，我们也必须记住，这种效应还有待全面研究。

最后，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主要机关应发挥关键作用，处理这种引发冲突、阻碍冲突后复原进程的现象。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国美国召开这次关于腐败与冲突问题的通报会。我们也欢迎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出席，他的相关分析揭示了腐败的严重性及其与世界各地冲突的关联。我国代表团也感谢“到此为止”计划创始主任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

毫无疑问，腐败是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似乎是各国面临的最复杂挑战之一。腐败是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可憎的恶行，可制造社会动荡的肥沃土壤，导致产生新形暴力，进而引发冲突，破坏国家财富的管理和分配机制。腐败一旦发展到泛滥的程度，将影响透明、正直、道德和公正的价值观，可破坏渴望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现代国家的基础。

腐败如同坏疽削弱国家机构履行其主权职能的能力，腐蚀国家机构，因此构成不稳定和冲突来源。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集中谈行政、司法和安全机构这三个领域，这些领域中的腐败问题体现了腐败对国家构成的挑战。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行政机构腐败对这些机构的工作效率及其公正性，尤其是对他们对客户的服务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产生挫折感，而挫折感则是社会冲突的因素。结果，这些机构往往失去公信力，难以成为促进民权平等的机构。

司法机构同样易受破坏，因为它们本当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帮助制约民主和经济治理，确保落实问责制。

作为保护人民和捍卫国家领土工具的安全机构腐败，则将破坏与民众的信任契约，成为社会紧张

的另一个来源。这种机构难以有效地控制边界和坚决打击各种贩运活动，特别是贩运毒品和小武器与轻武器的活动。

鉴于腐败破坏国家基础，特别是危机后局势国家基础的潜能巨大，非洲领导人已宣布2018年为非洲反腐年，其主题是："打赢反腐斗争：实现非洲可持续变革之路"。他们意在据此表明他们打击这一祸害的集体承诺和决心。

在这方面，4月12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召开第764次会议，强调必须在预防结构性冲突的框架内进一步整合非洲的治理架构，同时强调从全球视角制定非洲反腐败战略。事实上，如前所述，腐败是实行善政的主要障碍，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差距，助长有组织犯罪，阻碍民主。因此，腐败创造破坏国家稳定的条件，同时危及地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因此，7月1日和2日在努瓦克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大会第三十一届常会的最后声明，强调通过反腐机构自愿交换信息、提供司法互助和分享最佳做法，加强南南合作;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供财务信息等措施打击非法资金流动;通过教育和提高年轻人的认识打击腐败，投资创造人口红利。这些措施要求各地在反腐斗争中真正实现自主，以期分享经验，提高非洲反腐的效力。

还必须指出，腐败对冲突后国家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些国家原已受到国家机构缺失或薄弱及财政资源稀少的影响。在这方面，腐败可能破坏建立和保持和平进程的稳定性，甚至提高敌对行动复发的可能性。为了打破冲突后国家越来越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可考虑采取某些切实措施，限制腐败对其稳定和发展的腐蚀影响。其中可包括在和平协议中明确列入反腐措施;确保在冲突结束后立即采取反腐措施，及顾及各国的情况与相关能力;

加强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支持民间社会的反腐努力。

作为我国建设和平战略的一部分，认识到腐败是可能导致冲突复发的潜在因素，科特迪瓦一直努力加强我国的立法和体制框架，以打击这一祸害。

2014年4月16日，我国设立善治高级管理局，其任务包括制定和实施国家反腐战略，监督预防政策、反腐斗争及国际反腐合作的实施情况。

我国还加强了国家金融情报处理中心的能力，该中心负责打击非法金融交易和洗钱活动。我国也更新和加强了指导中央公共采购司工作的规定，以提高公共采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扩大审计院的审计权，以追踪和制止高级官员贪污公款和密切审查基金管理状况，也是我国体制改革的一个特点。

通过这些体制改革，应该能够阻止公共资金流失，设立一个国务委员会和上诉法院。

我国深信，打击腐败关涉国家、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我们不仅支持秘书长倡导的预防方针，而且支持促进国际反腐合作，包括分享经验和良好做法的必要性。

马朝旭先生（中国）：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所作的通报，也认真听取了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发言。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宗旨，也是《宪章》赋予安理会的首要职责。当前，国际形势面临复杂因素，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织。国际社会应协同行动，预防和解决冲突，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第一，坚持《宪章》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争端。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遵循。国家之间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冲突各方要坚持平等协商，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分歧。要进一步完善处理国际和平安全事务的机制和手段，更好地化解矛盾，消弥战乱与冲突。

第二，坚持标本兼治，解决冲突根源。国际社会要重视解决贫困、欠发展等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全面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落实援助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增强自身发展能力。要以和平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和平，使冲突地区民众早日享受到“和平红利”。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构建国际和平安全伙伴关系。各方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应对国际和平安全领域挑战。要发挥安理会在集体安全机制中的核心作用，联合国有关机构应分工协调，形成合力。非盟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地域、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优势，应支持其为维护本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斡旋活动，推动以对话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9月3日至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中国与非洲领导人围绕“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会议主题，推出加强中国与非洲全面合作的新举措，确立了未来3年及今后一段时间重点实施的“八大行动”。

在和平安全领域，中方决定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稳合作，继续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支持萨赫勒、亚丁湾、几内亚湾等地区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和反恐努力；设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为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加强交流提供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社会治安、联合国维和、打击海盗、反恐等领域推动实施50个安全援助项目。在联合国框架下，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开展的维和行动，并动员国际社会加大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等。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15周年。腐败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敌人。“大幅减少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及“加强追赃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被列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坚决打击腐败问题，避免给腐败分子留下任何空间和漏洞。中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大会等机制相关讨论，支持联合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发挥主渠道作用。中方愿同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一道，为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不断作出贡献。

格雷戈里·范·哈伦夫人（荷兰）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强调，腐败破坏民主价值和机构、道德价值观和正义。鉴于这些破坏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理事会以前从未讨论过腐败问题。因此，主席女士，我赞扬你今天将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在我的发言中，我想着重谈三个方面：法治、问责制和可持续发展。

法治是稳定社会、民主和公民信任政府的基础。如果法治是稳定的良药，那么腐败就是滋生冲突的病毒。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题为《非洲通往极端主义之路》的报告告诉我们，腐败和表现不佳的政府是如何将人们推到暴力极端分子手中的，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组织强调指出，那些参与受腐败驱动的非法经济活动的行为者希望使冲突永久化。与此同时，可靠、廉洁的政府被证明是复原力的源泉。因此，让我们加紧努力，加强法治，建设能力，建立真正为公民服务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

这让我想到我的第二点——问责制。接受问责的国家机构是强大的国家机构。问责制需要分权、制衡和司法后续行动。我要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在这方面提出的值得研究的具体建议。问责制不仅需要分权、制衡和司法后续行动；它也需要透明

度。为此，荷兰王国支持“透明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组织的年度腐败感排行指数表明了腐败和冲突之间的相互关联。它还表明，如果存在公民要求政府承担责任的机构，腐败就会减少。

《采掘业透明度倡议》也值得一提。《采掘业透明度倡议》标准要求政府公布其自然资源管理的信息，包括相关税款的去向。《采掘业透明度倡议》让人民能够发表知情的意见，荷兰王国自《倡议》问世以来一直是它的骄傲支持者，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内部监督机制以及民间社会、企业和独立审计员管理的外部监督机制，是追究国家机构责任的关键所在。

最后，关于我的第三点，即可持续发展，《保持和平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对预防冲突的最全面回应。然而，腐败破坏了它们的实施。它剥夺了最边缘化的人获得重要服务的机会。腐败减少了税收，加剧了怨愤和不满。腐败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成本。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和平、正义和强有力机构的目标16至关重要。解决腐败问题对可持续发展，进而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

最后，今天，安全理事会采取了第一个重要步骤来解决腐败及其与冲突的联系。为了安理会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我们呼吁秘书长在他今后的报告和通报中更明确地强调这一问题。已故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出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前言中写道，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和贫富”。让我们所有国家面临的腐败的破坏性后果把我们团结起来，努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邪恶现象。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通报，感谢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对腐败如何影响社会和引发冲突的叙述，以及他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具体建议。

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防止冲突以及处理其根源，这使腐败的话题对于其工作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欢迎今天的讨论，特别是它对预防和保持和平的重点强调。

腐败可被定义为滥用职权与信任，以谋取私利。它影响所有国家，不分国界，可在各级公共机构中扩散。腐败殃及全体民众，但对社会上最无权无势者的影响最为严重。妇女受腐败后果影响的风险常常更大。这是因为她们通常较难获取各种服务，受到性勒索和肉体虐待的风险更高。我们认识到腐败如何进一步破坏脆弱国家的稳定，最终成为驱动冲突的因素之一。联合国与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和平之路：防止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法”也提到，腐败是冲突与暴力的一个根本源头。相比之下，当民众信任其服务提供方、各种机构、政府以及当选官员时，实现社会稳定的道路就更加坚实。知晓所有人待遇平等给特别是最无权无势者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为制止政治排斥所致的暴力循环带来更好的机会。

在我们的多边努力下，对支持各种反腐倡议做出了有力的政治承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是关于强化机构的目标16和关于减少国家内和国家间不平等的目标10、《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这些承诺的重要基础。联合国的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议程也与反腐直接相关。关于保护和平的第2282 (2016)号决议强调了加强法治和倡导问责、善政以及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它还强调必须尊重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处理腐败问题是履行这些承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腐工作是我们在国内、多边层面以及发展合作中的一个高度优先事项。我们支持提高民主参与，这需要强有力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政治机构以及自由的媒体。这反过来提高了透明度与问责，从而使滥用职权更为困难。我们也支持伙伴国家通过强化税务和审计部门等机构来打击腐败。例如，5月份，我们举办了斯德哥尔摩税务会议，以倡导税务领域的能力建设。高效、透明以及有效力的税务管理支持了减贫与平等，与反腐密切相关。

我们每天在安理会看到冲突给各国带来破坏性影响，它们削弱机构与法治，从而为腐败打开更多渠道。我们在规划联合国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特派团时，必须切记这一点。必须把打击腐败纳入任务授权和我们提供的能力建设支持以及法治机构的改革。Prendergast先生提出了更多想法，包括我们如何能够改进制裁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想法非常值得考虑，也非常契合我们已启动的确保提高制裁工具效率的工作。

还必须确保联合国为会员国反腐努力提供的支持具有连贯性。各种特派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联合国实体必须齐心协力。我们还必须继续支持从业人员、检察官以及执法者之间的国际合作模式。反腐工作不只是处理腐败对各国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破坏性影响，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它关乎预防。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有效、接受问责并且包容的公共机构，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渠道，我们就会降低社会滑入或重陷冲突的风险。为此，从更广泛的预防与保持和平角度来说，腐败现在是、而且必须继续是安理会议程的一部分。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首先，我们愿感谢秘书长提供的信息及其对冲突局势下腐败威胁的评估。我们也感谢Prendergast先生的通报。

是的，冲突确实为赢利提供了空间，许多人也确实从中渔利。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许多冲突是因秘密和公开争夺自然资源而起，其中既涉及外部行为体，也有内部行为体。这一点在非洲比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加明显，想到那里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就让许多人按捺不住。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相反面。

正如秘书长今天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腐败是富裕和贫困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它也存在于今天向我们进行腐败说教的美国。它在那里以传统形式存在，只是常常披着独特机构的伪装，如合法游说。所以，如果人们想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议题，那么从其本国国内开始更符合逻辑，特别是就游说而言，因为它裹挟了美国的最高权力，受大量私人军品公司的利益所控制，这些公司的商业利益与国会里强大的国防游说人士的利益密不可分。

我谨告知安理会，乌克兰冲突的起因不是Yanukovych的腐败，而是用另一个政权来替换这个腐败政权的政变，该政权与Yanukovych政权不同，它实际上发动了对其本国民众的战争。安理会一些成员非常清楚乌克兰腐败的规模，因为那些人是其保护对象。正是这种腐败、包括军方的腐败助长了乌克兰东南部的冲突。

俄罗斯代表团一贯倡导加强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以团结国际社会一道努力防止腐败和打击这种祸患。我们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开展该领域国际合作的一个有力的国际法律框架。俄罗斯是首批签署和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我们于2003年12月签署并于2006年3月批准该《公约》。2015年，公约缔约国第六次会议在圣彼得堡召开。我们尤其关注审查公约执行情况的机制，我们认为，该机制独具一格、开放、透明并且非政治化，在平等、国家主权以及不干预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了政府间进程的职能。

我们支持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作用，为会员国努力有效执行这项重要《公约》的规定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努力确保其普及提供专家援助。俄罗斯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各种反腐项目的主要捐助方，其中包括多项联合举措，如每年针对参与公约执行情况审查的联络人和政府专家的筹备课程。2017年，俄罗斯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法律图书馆和反腐败知识网上门户工具与资源的运作提供了财政支持。6月份暨世界杯前夕在维也纳，我们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道，在金砖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南非的支持下，举办了一次关于防止体育腐败的国际会议。如我们所知，已在《公约》框架内成立了审查、追回财产以及预防方

面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还召开了国际合作方面的专家会议。所有这些形式均为开放式，具有政府间性质和技术性。

各国有关归还犯罪所得资产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和矛盾之处。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一贯支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制定相应的多边国际法律机制，这将有助于消除模糊领域，也有助于加强相关机构在提供刑事事项和引渡的司法互助以及打击洗钱方面的协调工作。

显而易见，不带政治色彩的反腐机制一直在有效运作，并在联合国不断完善。在这方面，有些倡议力求将这一专题奉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某种所谓新挑战，由此利用安全理事会的论坛和机制。我们不支持这些倡议。这只会破坏现有的模式，损害相关国家机构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展的务实合作。我们认为，联合国存在的分工使我们能够富有成效地应对反腐活动方面的挑战，而改变这种分工，特别是损害联合国权威的做法，有害无益。此举在客观上毫无理由。就我们而言，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协助开展国际合作的专门机构和机制，使其因时制宜，反映现有威胁不断变化的情况。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秘书长和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重要通报。

秘鲁高度重视使我们聚集一堂的问题。我国未能幸免于影响本半球的腐败之祸。在世界各区域，以及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的诸多冲突中，这一问题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腐败削弱公民对其当局和机构的信念和信任，破坏道德价值观、法治、正义和民主治理，也是有效满足我们各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其发展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

腐败和有组织犯罪范围广泛，跨越国界，并呈现多种形式，这必定促使我们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始终如一地应对我们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这包括安理会的工作，因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一祸患对各国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显然，腐败是诸多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它往往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联，而有组织犯罪反过来又通过洗钱和非法武器贸易等活动，成为资助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来源，为其推波助澜。在这方面，我们谨回顾5月8日的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8/9），其中要求我们深化调查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恐怖分子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有所关联的性质和广度。秘鲁高度重视根据《反腐败公约》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16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其中除其它外，要求我们促进和平和包容各方的社会，并加强法治。

我们强调，在大会和安理会最近重申的同文决议（第70/262号决议和第2282（2016）号决议）中，维持和平被确定为一项总体目标和长期进程，促使我们充分致力于巩固包容、透明和负责任的国家机构。

要有效打击腐败，就必须形成一股秉正无私、以宪法条款保障权力的行使受到制衡的风气。这包括充分诉诸司法，以确保不容存在有罪不罚现象，使妇女和青年更多地参与政治和体制生活。公民必须能够及时了解腐败案件中的指控，并在知情基础上参与政治生活。

我们还认为，腐败的范围之广，要求各国政府作出协调一致的应对。因此，在4月于利马举行的第八次美洲首脑会议上，秘鲁推动通过了《利马承诺》，其中包括57项措施和具体行动，以支持反腐斗争和这方面的区域合作。我们目前正努力加以落实。

鉴于有必要防止腐败演变为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拥有预警和交流良好做法的机制。因此，我们认为，正如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提议的那样，必须考虑将安理会制裁制度的范围扩大到从冲突中受益的腐败和洗钱网络。

最后，为加强按要求维持和平的国家机构，我们认为，必须确保在安理会授权在受冲突影响国家

开展的维和行动和其它特派团的任务规定中，酌情体现打击腐败的斗争和对基本自由的尊重。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和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我们认真听取了两位的通报，我们也认为，腐败侵蚀经济，削弱政府机构，促成其它相关犯罪，如洗钱和非法来源资金在国际上的转移，这些资金往往用于资助那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机制。同样，腐败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建设强有力机构的目标16的落实，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的挑战。

然而，腐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所有国家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本身构成威胁。在许多情况下，因缺乏经济资源而薄弱的体制机构，抑或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都可产生腐败。在缺乏国家治理机构的地方也可能出现腐败，这是冲突主要起因造成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腐败是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本组织相关附属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这些权力载于《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尊重这一点，仅限于处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事项。

安全理事会必须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宗旨和原则，确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安理会还必须在其决定和行动中遵守《宪章》和国际法。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其它机构的职权实施干涉，背离《宪章》宗旨和原则，有损这些机关的权威，侵犯了全体会员国的权利。

将腐败作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列入安理会的议程，不会增添任何价值，只会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并加深各国之间的分歧。在这方面，玻利维亚强调，安全理事会举行本次内容翔实通报会的决定不应被视为先例，不应导致损害全体会员国参加的主管机构的权威或授权，也不应导致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利用本次会议。同样，正如我们先前所说，该项举措既不应导致以打击腐败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借口，利用安全理事会破坏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不应被用于意识形态目的。同理，不应以其为借口，削弱合法民主政府或鼓励采取政权更迭政策。安理会应以身作则，维护和促进法治、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并且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国内管辖权。应该避免有选择、政治化地运用规则，以致加剧冲突、削弱安全理事会乃至联合国系统的信誉和权威。

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与会员国合作，建立和加强其机构和法治，自己承担起打击腐败的责任，我重复一遍，在这样做的时候要严格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玻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艾马总统与我国其他当局一道，为了透明度而自愿决定放弃银行保密，这在玻利维亚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个例子应该在全世界推广。此外，在国际一级，今年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通过十五周年，该公约享有广泛的国际共识，且已成为加强预防和减轻腐败风险的国际合作框架。在区域一级，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通过了《利马承诺》，以解决系统性腐败问题。玻利维亚加入了这些文件以及《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框架内也有反腐败举措。

然而，法律法规并不是一切。需要作出坚定的政治承诺来遏制这种现象，并采取具体行动消除这种恶行。在这方面，有必要努力消除避税港，并设计、通过和实施旨在监督和控制跨国公司的措施，一些跨国公司损害国家主权，并在许多情况下鼓励腐败和侵犯人权。正如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所提到，金融系统通过这些避税港和银行保密制度，与跨国公司一起被用来为腐败和掠夺自然资源等犯罪活动所得的资金洗钱，这些资金尤其被用于资助冲突。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首先是在全球金融体系内——打击腐败。最后，我们强调，我们坚信在国际一级促进法治是现实更公平世界的关键，也是实现能够有效处理腐败现象并尊重所有国家主权的联合国的关键。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感谢你举行这次重要会议，也感谢你的概念说明。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和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通报，我们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对定向制裁的想法和提议。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想法和提议。安全理事会已经设法从一般制裁转向有针对性的“聪明”制裁。然而，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更透彻地评估这一经验。我将在发言中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腐败的原因和影响；第二，联合国在打击腐败和国际合作中的作用；第三，科威特国为打击腐败所采取的步骤。第一，关于腐败的原因和影响，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正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扩散的影响。秘书长提到的一些事实和数字突出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遭受政治或安全动乱的地区。腐败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有一些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如贫困、压迫、不平等、侵犯人权、社会正义水平下降以及缺乏法治。这都为腐败的扩散创造了沃土。与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类似，社会腐败程度的增加对各国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例子和冲突证明，腐败的扩散和冲突的激烈程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冲突越激烈，腐败就越严重，因此冲突会长期持续。腐败的风险不仅限于一个国家，它还威胁区域和国际安全。腐败的扩散加深了人类的痛苦、不公正以及公共和私人资源的滥用和浪费。腐败会通过降低经济增长、减缓发展、增加失业和贫困来摧毁各国经济。第二，关于联合国在打击腐败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大会于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被视作一个坚实的法律框架，其中包括一套规范、措施和规则，该公约的全体缔约方都应加以执行，以促进公约打击腐败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它们一旦得到执行，就会减少腐败发生率，这尤其是因为该公约进一步指出，联合国将向会员国提供援助，用于能力建设和执行旨在促进透明度、廉正、问责制和法治的方案。因此我们敦促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对这一现象采取集体立场，以便我们能为所有人实现更加繁荣的公正未来。在这方面，我们强调需要加强与区域和国际实体的合作与协调，以促进打击腐败的措施。我们必须建立区域网络，打击腐败，加强合作，分享专门知识，努力执行一些领域——如引渡和信息交换领域——的联合国公约。正如秘书长在通报中提到的那样，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国家。第三，2016年，科威特国设立了一个反腐败局，以履行我们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承担的义务。我将简要提及该局希望实现的一些目标，它们是：促进经济和行政交易的透明度和廉正原则；执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打击腐败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努力打击腐败，减少其威胁和影响，并起诉犯罪者；依法收缴和追回腐败所得资产和收益；保护国家机构免遭贿赂、权力交易和滥用职权的影响；保护举报腐败的人员；促进与各国及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并吸收其参与的原则；鼓励并促成民间社会机构和组织发挥作用，以打击腐败，提高社会对腐败风险的认识。最后，我们强调，打击和消除腐败是一项始于个人且国家须普遍承担的共同责任。腐败是一种工具，使犯罪者能够迅速、不正当、非法地达到目的。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社会和向所有人提供体面的生活和平等，通过各国政府执行与该问题有关的国际公约和条约，最重要的是毫无歧视地加强和运用法治，消除这种现象。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在本次重要辩论会上发言，因此，我首先要祝贺美国代表团和尼基•黑利大使把腐败这个重要问题首次纳入安全理事会议程。今天的辩论会在9月9日“非洲日”之后一天举行，我们以“打赢反腐斗争：非洲可持续转型之路”为主题举行了庆祝。我还愿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和普伦德加斯特先生做了有见解的通报，大大丰富了今天的议程。

如果我们把腐败理解为腐蚀某人或者容许自己腐化、滥用一个人的职位来获取或提供非法好处的行为，那我们可以说，腐败是一种道德败坏形式，其影响范围蔓延到各个层面，特别是公共服务，但

也包括私营企业部门。显然，“腐败”一词意味着把服务转移提供给其他非法接受者或这种行为造成的结果——通常是经济性的——构成挪用行为。因此，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涵盖这个问题。

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和欺诈是一些腐败行径，体现在为公职官员提供钱财，以便换取服务，或者让他们不履行公务职责等行为中。不幸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祸害没有国家之别，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现象。尽管一些国家的腐败案件可能比其它国家多，但腐败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同问题和关切，因此，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经验和战略交流对全球都有益。

尽管腐败不是它们的唯一资金来源，但是，黑帮、恐怖分子、犯罪网络和雇佣兵为满足他们各不相同的野心，也借助敲诈勒索和腐蚀某些官员来获取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导致战争、公共秩序混乱、浪费等现象，许多情况下，最终目标是攫取国家的政治或经济权力，特别是它们的自然资源。我国赤道几内亚多次沦为此类企图的受害者，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12月。

就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而言，不仅《国家中央政府公务员法》禁止和惩处参与此类腐败行为的官员，包括开除公职，我们还在2004年2月5日颁布了一道法令，实施履行公共职责的操守和尊严法。我们认为，如果公务员保持高尚的道德价值观和操守，他们将更难以自甘堕落，犯下腐败等罪行，因为这些行为完全违背他们的道德观。

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先生阁下和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及其给世界各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多次公开谴责腐败行径，并且采取适当行动，敦促国家立法机构制订旨在打击腐败的所有可能法律文书。

我还必须指出，我们名为《2020年展望》的国家发展计划把实现善政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显然包括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措施，包括减贫。我们希望，通过实现这些目标，将使为让某些公务员误入歧途的行为开脱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许多研究人员同意，改善工作条件是必须审视的一个方面，以便减轻这个问题的影响。因此，我们鼓励国际社会确保各个国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来确保善政，由此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以便减少腐败趋势。

在建设和平领域，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一直在中部非洲次区域和整个非洲大陆提供人力和资金，竭尽所能作出贡献。要使国际社会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各国就必须参与进来，改善它们的国内立法，使它们能够应对这一全球祸害，并且加强合作。在这方面，我借此机会赞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迄今为铲除许多国家腐败开展的工作和作出的巨大努力，目标是减少在这些国家酝酿和长期存在的严重冲突。因此，为了预防各种表现的腐败所助长的冲突，国家有义务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并且采取预防性措施来减少腐败，在许多国家社会，这种行为正变成系统性问题。

遗憾的是，跨国企业有一些强国撑腰，并且拥有大量财政资源，它们为求实现最大化的利润目标，有些时候腐化官员，特别是最贫穷国家的官员，以便在法律制订的规则之外行事，由此获取巨额利润。因此，企业行为体及其支持者也应承担道义责任，遵守他们业务所在国家的法律，接受法治，并且避免有罪不罚现象，因为这是另一个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源头，因此是可能的冲突根源。

按照非洲联盟的立场，我们敦促冲突国家加强它们的公共机构、透明度以及腐败行为犯罪人究责制，因为这些行为强化武装团体，为通过贩运武器、毒品和人口谋求个人利益提供便利，并且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这些行动至关重要，以便实现我们的崇高目标，使我们大陆的枪声平息，并且尽快结束所有冲突。

我们认为，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和政治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必须包括能够使它们获得更多有关冲突

当事方国际金融信息的措施和战略，以便减少腐败现象，这一现象影响冲突的持续时间，此外，应根据各个具体情况制订具体办法，控制并监测实地的资金、必要的支出和实际付款，由此确保详尽和公正的账目。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阿根廷记者Hugo Alconada Mon的话，他在他所著的《一切罪恶根源》一书中指出："腐败就像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能跳。"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主动召开今天的通报会。也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和约翰·普伦德加斯特先生所作的非常翔实的通报。

有人可能会说腐败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腐败破坏政府机构，削弱司法系统和国家经济。腐败还削弱了军队对抗恐怖团体的能力，尤其是在士兵薪水不高或装备不足的国家。腐败会在士气低落的环境中变得猖獗。腐败为恐怖分子提供获得资金和武器的机会，破坏法治、善政和人权。普遍存在的系统性腐败是许多冲突的根源之一，这些冲突可能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腐败也是阻碍成功进行冲突后重建的主要结构性障碍之一，对联合国系统的三个基本支柱，即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切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腐败不以国界为限。腐败与恐怖主义已在冲突国家联手，安全理事会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这既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的一个因素，也是其后果。我谨向安理会介绍几个我们认为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想法。

首先，我们应该转而采用旨在推动改革的财政施压政策。捐赠者应该发出明确信号，表示如果有关政府不采取保障措施预防腐败，他们将停止出资或拒绝执行项目。必要时应扩大安全理事会制裁的范围。通过同时瞄准多个行为体，有机会扩大影响。

第二，关于善政和透明度，波兰认为打击腐败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成员国和国际机构应支持长期的民主和透明进程以及治理改革。必须重新评估各部门的能力建设方案，使其不再支持现有的腐败体制。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政治意愿，任何改革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呼吁普遍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呼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盟等处理腐败问题的机构密切开展合作。我们还将民间社会视为这一领域的重要伙伴。

多年来，波兰一直在人权理事会倡导通过一项关于善政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作用的决议草案，其重点之一是打击腐败。波兰还成功地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在地方和区域两级实施了有助于减少政府部门腐败的措施。我们还提供培训，分享反洗钱做法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

最后，我们呼吁在必要时颁布反洗钱措施。金融行动任务组等机构已经制定了打击洗钱的国际标准，各国应该使用这套措施，在国家一级实施。如果各国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可以打造一个腐败、资助恐怖主义和洗钱行为无处可藏的环境。

最后，波兰充分致力于减少腐败。腐败会破坏人们的生活、扰乱国家发展，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腐败的影响。减少腐败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这使其成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更加宏伟的目标，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实现它。

瓜迪女士（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感谢普伦德加斯特先生的发言。

我们都认识到了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腐败有损公共事务管理的问责制和透明度，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正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序言所述，它也会对社会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同时破坏民主体制和价值、伦理

道德观和正义，危害可持续发展和法治。我们承认这一点，但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在安全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之内。根据互补原则，安理会应该能够允许其他相关机构处理这种跨领域的问题。

当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安理会着眼于具体冲突局势审议腐败问题，而且我们知道目前为止都是这种情况。在各种相关制裁制度的框架内，安理会一直在采取措施应对挪用公共资源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举出若干案例，安理会在这些案例中决定禁止木炭、石油和矿物贸易。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安理会还通过了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重要决议。安理会应继续酌情使用这些工具，减少腐败在煽动和助长冲突和暴力方面的负面影响。然而，即使在具体冲突局势下，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腐败，因为腐败不是唯一因素，而是造成不稳定和冲突的许多其他严重政治和社会经济挑战的一个表现。因此，制裁不能是应对腐败所造成的威胁的唯一工具。

必须有一项旨在消除冲突根源——腐败可能是其中之一——的全面和长期战略。要消除根源，必须确保善政，加强国家机构，促进问责制和透明度并确保法治。打击腐败的任务也不应由政府单独承担；这需要社会各阶层，包括妇女、青年、媒体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正是由于范围广、层面多，我们才认为腐败问题应该由其他相关的联合国机构来处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唯一一项提供全面应对措施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腐败文书，我们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加入该公约。在这方面，我们赞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即在预防、教育、资产追回和刑事司法系统廉正等多个腐败相关专题领域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我们非洲一直因为腐败而面临严重挑战。腐败阻碍了旨在促进民主治理、社会经济转型、和平与安全以及享有人权的努力。由塔博·姆贝基总统担任主席的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在2015年2月提交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该报告发现，通过非法资金流动，非洲国家平均每年损失500亿美元，这一数额有可能升至1480亿美元。同样根据该报告，腐败做法在促成这些资金外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非洲联盟宣布2018年为非洲反腐败年，以遏止腐败。腐败被视为重大社会缺陷，造成非洲大陆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受挫。我们的领导人感到，如果不优先消除腐败，非洲就无法在实现其《2063年议程》和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计划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非洲争取使枪声沉寂的努力也不会成功。

在非洲联盟层面，我们还制定了《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以及其他旨在促进民主文化和确保善政与法治的法律文书。我们认为，联合国各相关机构与非洲联盟及其各区域机制在打击腐败方面加强合作与协作是件需要鼓励的事情。

中午散会。